

柯仲平陇东往事

□ 刘志洲

柯仲平(1902—1964),生于云南广南县,上世纪二三十年活跃在中国新诗坛上,被称为“狂飙诗人”。

1937年11月,柯仲平来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文协主席。他组织成立“民众剧团”,自编节目,用陕北民歌演出,受到广大群众欢迎。每到一处,群众送给他们许多花生、枣子、熟鸡蛋,表达他们对剧团节目的喜爱之情。

1943年11月30日,柯仲平率“民众剧团”冒着严寒,从延安出发,经甘泉、富县、黑水寺、合水西华池,12月3日到了陇东分区驻地庆阳城,随后到各县区巡回演出长达三个多月时间。1944年在庆阳度过春节,开春后返回延安。巡回演出期间,他创作了《马渠游击小组》(后经修改,成为当时很轰动的《无敌民兵》)《模范城壕村》《孙万福回来了》三个大型歌剧。这三个歌剧作品,都是在紧张的革命战争中,柯仲平在短短三四个小时里创作的,题材都是根据发生在陇东的真人真事,而且写完,即由剧团排练上演,及时地配合了当时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斗争。随后在延安等地巡回演出,引起轰动。1944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文委召开的春节文艺下乡总结会上评出获奖剧目31个,《模范城壕村》获得剧本创作一等奖。

到了陇东庆阳以后,柯仲平基本上便是以深入生活,写东西为主,跟演出团分开行动了。边界上的马渠(镇原县)有个游击小组,是一支模范民兵武装,在抗击国民党顽军的骚扰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土地革命时期,边区的赤卫队和游击小组,就是当时红军的得力助手,也是红军胜利发展的基础。柯仲平便到马渠去住了些日子,和游击队小组的同志们一起生活,了解他们,听他们和群众讲他们那些英雄的故事,然后便回到庆

阳埋头创作。他的写作时间,是从天黑到天明,与大家的工作时间恰恰相反。大家又都住在一个院里,难免对他的写作有所干扰,他一般都克制着,没有发作。有一天晚饭后,音乐组的屋里又拉又唱,又说又笑,吵得他没法下笔,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便跑到院里来大声嚷嚷:“喂!喂!音乐家们!你们安静点好不好?别人正在写东西哩!”柯仲平的呵斥,马上生效,院里立刻鸦雀无声。他就是这个脾气,爱起来巴不得把你含在嘴里,生气了恨不得把你吃掉,事情一过去他便忘光了。第二天晚饭后,他来到音乐组屋里,和大家有说有笑,东拉西扯,居然扯到他青年时代的一场恋爱,讲得绘声绘色。

柯仲平和同志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理解他、尊敬他、爱他,还有点怕他。他就这样没日没夜,不几天,一个可以演三个钟头的大剧本《马渠游击小组》就写出来了。歌剧以陕甘宁边区陇东边界马渠民兵对敌斗争的真实故事为素材,写的是真人真事,用的是真名。歌剧揭露了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制造事端,挑起内战的罪恶行径,表现了民兵游击小组劳武结合、保卫边区的英勇斗争。歌剧由音乐组的岳松、彦军、川静、刘烽等同志配上调子,陇东味的,民歌风的,又新鲜,又动人。文工团雷厉风行,马上分配角色排练。有时柯仲平还亲自参加导演,要求严苛。他一来,排练场的气氛就变了,谁也不敢吊儿郎当。排练期间,马渠游击小组的同志们常被请来,与演员交朋友、提意见,这里像,那里不像的。很快,戏便上演了,群众看得津津有味,有效地配合了当时对敌的斗争。

1946年边区从平时转入战时状态后,“为战争服务”成为边区文艺工作者的最高目标。柯仲平响应“动员起来,保卫边区”的号召,对《马渠游

击小组》进行了修改,把真名真姓、真人真事去掉,加入边区边境的一些民兵材料,进行了再创作,改为十六场大型歌剧,改名为《无敌民兵》。

1946年10月24日至11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连载了该剧本。12月24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柯仲平写在《无敌民兵》剧本扉页上简短的“小引”。柯仲平写道:“……这是歌剧,在广场上给老百姓当作大秧歌剧也成。调子,全用西北民歌和曲子戏上的,也可以试用秦腔。各地剧团,文工团要演,可自己另选配曲调。用创作群众性的新曲调来演唱,也很好。只要能在群众中收到好效果,演出的团体如需要改变此剧,也可以。在不需要演全本的地方,选出一个或几个场来演,大概也可以。写得不好,望大家指教……”老诗人一连用了许多“也成”“也可以”“试用”,目的就是自己的作品能够更好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是为了在为他们服务时“收到好效果!”同日《解放日报》还刊登了狄耕、林间等看了《无敌民兵》后的笔谈,写道:戏剧一开场,便把一群朝气蓬勃的健儿拥上了舞台。他们是边区的农民,也是民族的骄傲,迈着英勇的步子,持着枪,用敏锐而仇恨的眼睛,监视着另外一群——蒋介石的顽固军的蠢动。几个主要人物,游击小组组长王登高、组员及王登高的父亲、妻子等都鲜明、生动。《无敌民兵》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为战争服务的题材,以游击小组的建立和巩固,以实际的错综的事件,和不漏掉现实生活中有关细节,呈现出现实生活的画幅,是一种教育和战斗情绪的激发。这出歌剧,在解放战争中,在西北战场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进城后也还在演,成为西北文工团的保留节目。剧本被收在《人民文艺丛书》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中。

(连载一)

珍赏

婴戏水盂添稚趣

□ 李连清

婴戏图,亦称戏婴图,以儿童游戏为题材,描绘出童稚世界无忧无虑、稚拙可爱的生动场景。婴戏图画面一般简约明快,清新活泼,人物形态可鞠,表情生动自然,加上婴戏图所蕴含的一些美好的寓意,故深受古人喜爱,在中国人物画中极具特色。到唐代,婴戏图日趋成熟,宋代最为鼎盛,其后一直长盛不衰。正是因为婴戏图充满的浓郁情趣,我国历代多有婴戏图佳作传世,如唐朝的张萱和周昉、宋朝的苏汉臣和李嵩等,都以精于婴戏图而闻名于世。婴戏图亦被广泛运用于瓷器上作为装饰,最早出现于唐代长沙窑瓷器上,到了宋代,景德镇窑、定窑、磁州窑、介休窑、耀州窑等诸多窑口多有烧造,明清至民国时期,婴戏图在陶瓷上的运用一直长盛不衰,且多具吉祥如意,如五子登科、连生贵子、百子千孙、多子多福等。

附图为民国时期的粉彩婴戏侍女图水盂,侈口,短颈,口沿外撇。溜肩鼓腹圆足。肩部一周绘花卉纹饰,红绿黄相间,鲜艳夺目,清丽粉润。腹部为婴戏侍女图主题纹饰。上腹大片留白,使画面显得空旷开阔,展示了室外大自然的特定环境。只见在一片平地之上,由太湖石营造出来的假山玲珑剔透,与花草一起成为画面的装饰之物,花草草绿,坡地边缘,植被葳蕤处隐见断裂层面,与上方的留白交融,显示出作者所选取的场景处于一片山坡平地,给画面平添出一种平中见险的意境。一架造型独特的蓝色几案摆放在平坡之上,几上书卷摆放齐整,一束花草伸出花瓶口,恣意绽放。一个头挽发髻、身穿红裙的侍女



坐于几案边上,贤淑恬静,长裾曳地不见足部,显得风韵有致。一个头扎小辫、娇憨可爱的男童由远及近,正一路追逐着一只红蜻蜓向几案跑来。儿童面部丰满,笑容满面,目视慌慌张张的蜻蜓,手舞足蹈,颇有几分南宋诗人杨万里笔下顽童追逐蝴蝶“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童真意趣。儿童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憨态可掬,稚趣横生,令人见之,不禁心生出几分怜爱。此时,几案上的侍女头部略倾,看着因疲惫和惊吓而低飞于地面上蜻蜓,双手对着正嬉笑追逐蜻蜓儿童轻摇,显然是要儿童停止追逐,让蜻蜓得以

喘息片时,人物形象生动,一种女性的慈爱之心溢于画端。溜腹下收,绘一圈蓝色回纹,格调素洁淡雅,与溜肩处明艳的色彩上下呼应,烘托了主题画面气氛。底部的“麟趾呈祥”款识清晰规整,旧时用于祝贺人家喜得贵子,可谓画龙点睛,为器物增添了美好寓意。从款识来看,此器物的烧造多用于顾客购买后作为祝贺人家喜得贵子的贺礼。

粉彩始创于清康熙晚期,盛于雍正,乾隆以后大量生产。因其彩料不需要进口,成本较低,色彩绵软柔和鲜亮,深受人们喜爱,故清晚期成为景德镇窑及国内其他窑口主要产品的品种。民国时期,尽管那些原来专门为皇家烧制御瓷的官窑纷纷倒闭或停办,但许多名匠高手流落到各个民窑,烧制的瓷器无论是器形还是风格,都保持了官窑的水准。这一时期,各窑口仿古之风盛行,多以复制各朝代及近代名画为主,以婴戏图作为瓷器主要装饰题材亦被广泛运用,尤以粉彩瓷最为常见。

该器物形制规整大气,胎釉细腻莹润,细腻匀白,画面融合了中国工笔重彩的构图于技法,线条工细流畅,阴阳衬托,浓淡分明,立体感强,色泽柔和淡雅又鲜亮明快。画面风格简洁舒朗而近于写实,尤其是人物的刻画生动传神,侍女的娇羞爱怜风韵逸致,童子的天真活泼纯真自然,服饰、神态各依身份,惟妙惟肖,妙趣横生。当他们被刻画在号称“文房第五宝”的水盂(主要用于给砚池添水或书房观赏陈设)上时,令人赏心悦目,为书房增添了不少情趣。

丝路览胜

清代陇上盛名独具的凉州“四大书院”

□ 张国才 柴多茂

在我国绵延悠久的历史,书院作为一种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场所和传播载体,并作为官办教育的补充,在儒家经典的研究与整理、君子德行和节气的养成、经世安邦人才的培养,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武威莫道是边城,文物前贤起后生。”在清代,地处河西走廊的凉州府武威县先后创建了成章书院、天梯书院、北溟书院、雍凉书院等4所规模较大书院,走出了如张美如、张澍、潘挹奎、李于锺等一批在全国较有影响的学者,成为清代甘肃颇负盛名的书院。

清代的武威文教

清初沿用明制,雍正二年(1724年)改卫为府。于是,凉州卫变为凉州府,府治在武威县,下辖武威、永昌、镇番(今民勤)、古浪、平番(今永登)五县。在清代的二百余年,朝廷非常重视科举取士的制度,特别是在康熙时期大力提倡“崇儒重道”,并特开“博学鸿词科”,广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辈,形成了“右文之盛,前古罕闻”的盛况。这一时期,武威人文荟萃,英才辈出。据《五凉全志·武威县志》记载,止乾隆末,武威人考中

文进士8人,武进士6人,文武举人88人,贡生103人。又据《甘肃进士录》记载,自顺治至光绪的231年间,武威人考中进士的共31人,涌现出了张美如、张澍、李铭汉等一大批知名学者。“武威文风甲于秦陇”“自乾嘉以降,彬彬多文学士矣!”“人文之盛,向为河西之冠”。“甘省文风,初为宁夏最盛,今则莫盛于凉州之武威”等赞誉不绝于史书。

成章书院与天梯书院

成章书院是清代武威县创建的第一个书院,地址在“凉之北厅旧址”(今凉州区和平街小学一带),由凉州武廷适捐资创建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经广东巡抚彭鹏的举荐,51岁的武廷适出任陕西凉州道。武廷适字周南,原籍云中(今山西大同),后迁居凉县,是一位“沉酣经史”“雅爱斯文”之人。据《凉州道宪武廷适创建书院碑》记载,武廷适在修葺武威文庙后,“嗣即卜凉之北厅旧址,捐资亲督修葺,创为书院”,书院“地势高敞,规模巍焕”。《五凉全志·武威县志》记载,成章书院建成后,武廷适不仅“延师课士”,而且“每月亲临校阅”,使得武威“文风由此丕变”,成为当时继文庙之后,武威城内的一个重要文化地标。

三十四年后(即乾隆三年,1738年),时任凉州道的何炳安筹资对成章书院进行了修葺。乾隆十二年(1747年),在凉州道张之浚倡议下,凉州知府朱佐汤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尽管环境非常艰苦,但是每到儿童节,都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围绕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我党十分重视儿童工作,从团中央到地方各级团组织,都设立儿童局,领导儿童团工作。毛泽东非常关心边区儿童的培养和教育。在延安时期,他多次为儿童工作题词。1938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了一份石印的4开小报《边区儿童》,目的是为了教育引导孩子们在战争环境中茁壮成长。毛泽东得知后,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亲笔为这份儿童小报的创刊题词:“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1938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柳林村建立了“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即延安保育院,目的是为了保障抗日根据地的孩子们健康成长。毛泽东专门题词:“好好的保育儿童”;“为教育后代而努力”。毛泽东的这些题词,既体现了他对儿童工作的重视,又体现了对儿童工作者的严格要求。

民国时期的儿童节是4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曾连续三年为儿童节题词。1940年4月4日,毛泽东专为儿童节题词:“天天向上”。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于4月12日以醒目大字发表了这个题词。1941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十届儿童节庆祝活动,毛泽东题词:“好生保育儿童”,并发表在4月13日的《新中华报》上。1942年4月,延安纪念儿童节时,毛泽东特地为《解放日报》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这三次题词,体现了毛泽东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殷切期望。

“抗日儿童团,爱国好少年,努力学习为抗战!机动灵活撒传单,快速行动把情报传,救护伤员勇敢上前线。抗日儿童团,为打日寇做贡献,抗战胜利把国建、把国建!”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流传在边区的儿童团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边区政府,每到“四四”儿童节,孩子们唱着这样的歌曲,举行各种活动,展示自己的力量。每年的儿童节,儿童团都要举行大检阅,检查学习成绩、野外演习和游戏等,生动有趣,又富有教育意义。

1940年4月2日至6日,陕甘宁边区举行隆重而又丰富多彩的儿童节纪念活动,既有集中的大会,又有分组活动。来自延安保育院小学部和安塞、延川、延长、固林、安定、延安等县市的600多名儿童参加了纪念活动。在大会上,成立了儿童营,组建了总指挥部,15岁的刘德才被选为总指挥,600个孩子编为六个大队,过着有组织、有严格纪律的军营生活;孩子们在窑洞里举行政治测验,他们将平日里的学习和思考,几分钟内写在一张纸上,并评选出成绩优秀者;他们还召开座谈会,交流各根据地和边区儿童工作情况,讲述儿童团杀敌人、捉汉奸的感人事迹,提出问题互相讨论;儿童团员们举行健身操、棍棒操和队形转换、刺枪、劈刀、投手榴弹、拳术等军事项目表演;举行儿童文艺晚会、游艺运动会,放映电影,向毛主席献画像《毛泽东同志与儿童》和从家乡带来的大枣、花生等土特产;大会还评选奖励了模范儿童和劳动小英雄等。

当时在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还流传着一首《抗日儿童团歌》:“月儿弯弯,星光闪闪,我们都是儿童团。站岗放哨,又当侦探,盘查行人捉汉奸。鬼子来了,我们就跑,跑到八路军去报告。领着八路,拿着枪刀,杀退鬼子,家乡保。”陕甘宁边区的儿童全部动员起来了,积极参加抗战,查路条、送情报、演文艺节目。曾经到延安采访的华侨女记者黄薇在战地通讯中写道:“途中遇到不少站岗放哨的‘小哨兵’,他们有的站在道路的叉口,有的站在不令人注意的地方……看见远处来了生疏的人,他们便停止游戏,注意来人的一举一动。”

新中国建立后,将每年6月1日定为儿童节。此后,每到“六一”儿童节,全国各地都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阳光雨露下健康快乐地茁壮成长。

(连载一)